

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裴长洪

[摘要] 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建设,不能不考虑和探索中华文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扎根中国的重要意义。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它能够在激荡的论争中得到迅速传播并最终占主导地位,让我们不能不思考中国文化土壤这一深层因素。同情劳苦大众和民惟邦本的政治主张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立场和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有共通之处;反对贫富分化的社会改革理想与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剥削劳动者的理论相通;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和远大志向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远大抱负契合;反抗黑暗统治和压迫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思想也有关联;追求天下大同是中外文化共同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把这些美好的愿望从空想变成了科学。除了文化土壤条件,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能够在中国扎根,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理论与实践进行创造与创新更为关键。这包括:利用反抗外侮的民族传统发展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群众运动;唤醒中国农民伟力激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大动力;利用和节制民族资本创造“两个结合”新境界。

[关键词] 中华文明;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文化传承; “第二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480X(2025)03-0005-17

DOI:10.19581/j.cnki.ciejournal.2025.03.001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并特别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我们要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建设,不能不考虑和探索中华文明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扎根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至60年代基本形成,但它传入中国则是在近半个世纪之后。19世纪末期,马克思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报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仅仅在30多年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思想界的论争中胜出并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的理论基础,之后成为新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流。中国人民如此迅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古今中外思想文化史罕见的现象。在具有五千年文明

[收稿日期] 2024-11-05

[作者简介]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电子邮箱:peichcass739@163.com。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

的国家中吸收一种外来文化，必然与中华文明的土壤条件有关，必然与中国人吸收消化与创新外来文化有关。本文尝试探索这一现象的原因。

一、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在论争中传播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是同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一同传入中国的。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理论的是外国传教士。1898年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胡贻谷将英国人柯卡普撰写的《社会主义史》翻译成中文，并以《泰西民法志》的书名由上海广学会出版。书中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三个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但由于该书发行量极其有限，因此影响不大。中国人最早提到马克思的是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梁启超。1902年10月他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提到：“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①1903年他又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一文中说：“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②但梁启超并没有去真正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

1903年以后，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发展，中国思想界开始翻译出版国外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书籍，其中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片段，而且主要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留日学生马君武1903年2月在《译书汇编》杂志发表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并开列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目，这是中国最早开列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书单。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民报》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阵地，其中朱执信所做的贡献最为突出，1905年和1906年他连续在《民报》上发表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介绍《资本论》时指出：《资本论》是马克思的最主要著作，“马尔克（即马克思）为学者所长也，以资本论”“其学理之论议尤为世所宗者”“马尔克此论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③1912年朱执信还在《新世界》杂志第2期发表《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之学说》一文，这是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第一篇对《资本论》作出专门介绍的文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做过重要介绍。19世纪末期他流亡欧洲时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并称许这些理论。他说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1912年10月他在上海社会党总部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派别及批评》的演讲，对马克思和《资本论》作出高度评价和阐释。他说：马克思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阐发真理，不遗余力，使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因而，对社会主义之研究不可以只去迎合一些粗浅的言论，而不去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孙中山的这些言论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宣传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最早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他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并没有想过要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所理想的社会主义，尽管他们都抱着各自的目的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文化传统心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感到新鲜并愿意传播的重要因素。由于这种传播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的，也是零碎、粗浅和不完整的，甚至不准确和曲解，因此，尽管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初步传入，但并不可能真正传播开来。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主要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特别是在中国的五四运动前后。早期中

^①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111页。

^②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262页。

^③ 参见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载《二十世纪中国经世文编》，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年，第418—431页。

国共产党人是十月革命后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李大钊从1918年下半年起便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多篇文章,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目的在于要变革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其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在文章中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思想。1919年5月,李大钊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时,他重点介绍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时,着重介绍了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揭露了资本剥削的秘密,以及大资本侵夺广大工人和中小资本的本质;在阐释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时,重点介绍了阶级斗争理论,并指出阶级斗争的最终逻辑是经济原因。李大钊还利用主持北大图书馆的有利条件,为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和社团提供研究和学习的便利。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宣传,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作为外来文化与其他外来经济理论的本质区别。

陈独秀也为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作出过重要贡献。1920年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谈政治》一文,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关于生产与分配的原理。此外,他还在批判当时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中阐述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由于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早期的共产党人李达也是积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和《马克思经济学说》,1919年6月他在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续发表文章,介绍科学社会主义,阐述社会主义生产、分配和所有制关系等经济特征,认为只有生产资料公有,才能协调生产,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按劳分配。1920年他到北京后参与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并担任处于半秘密状态的《共产党》月刊的主编。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把握比较准确,因此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译文也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的传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1919年5月译文《劳动与资本》在《晨报》副刊“马克思研究”专栏连载;6月翻译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译文《马氏资本论》连载发表;1920年10月翻译马克思《资本论序言》的译文在《民国》杂志第二卷第三号刊出;同年翻译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经济与政治》的译文《过渡时代之经济》在北京青年创办的《曙光》杂志第二卷第一号刊出。这些学术研究和宣传活动都为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它必然受到帝国主义、军阀和反动政府以及各种敌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人的反对。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生命旅程中的每一步都需要经过战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在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理论界经历了三次大论争。

第一次是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1919年6月,胡适利用陈独秀被捕、李大钊被迫返乡、他把持《每周评论》的机会,连续刊载美国实用主义学派杜威的讲演录。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起过一定作用,但他们并不愿意让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让人们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①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要“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① 参见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11月27日)。载《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645页。

显然，其目的是用这种说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承认现实中存在着社会阶级斗争，因此才有改良主义学说的产生，而改良主义宣扬中国不需要经过革命就能够解决他所说的一个个问题。

针对胡适的观点，虽然李大钊返乡家居，但仍然于1919年8月撰文《再论问题与主义》批驳胡适。他说“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为此必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才“有解决希望”。^①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希望。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改良主义主张，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一切政治、社会、伦理思想的变更归根到底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阐明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的主张。他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都解决了。”^②针对胡适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李大钊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如果不主张阶级斗争，“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这场论争持续了两年，参与论争的人数不少，这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各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他们的认识水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阐述了对中国社会进行一次彻底革命的必要性，同时也说明了用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第二次是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论争。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他信奉英国的基尔特主义。^③在讲学中罗素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和发展实业。陪同罗素的《改造》杂志主要撰稿人张东荪对这些观点十分赞赏。1920年11月至12月，他先后在《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连续发表文章，系统阐述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1921年梁启超也在《改造》杂志发表了《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支持、补充和发扬了张东荪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出路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发展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是穷到极点了”，因此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他们还认为，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因此“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认为中国不存在劳动阶级，没有兴起社会主义运动的条件和基础，也没有成立工人政党的必要，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必定是无结果”的。口头上他们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但又断言中国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正如张东荪所说，“夫中国今日不能不奖励生产事业以图救死，而生产事业，十中八九，不能不委诸‘将本求利’之资本家”。^④并认为在外国势力和帝国主义扶持下，中国绅商阶级必能逐渐壮大，所以中国的前途和出路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针对张、梁的言论，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和蔡和森等纷纷著文反驳。他们指出，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陈独秀说：“中国若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纸，是何人排印出来的？”中国的工业发达不如欧美

① 参见《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页。

② 参见《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页。

③ 基尔特是英文Guild的译音，意为“行会”。该主义认为不需要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依靠职工的行会组织就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其目的是借社会主义之名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④ 参见梁启超：《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载《五四运动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515页。

和日本,但中国无产阶级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更甚,他们生活极苦、工价极低,但由于没有组织起来而不能抵抗资本家,因此这种状态下除了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①在中国,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的团体,建立共产党,不仅有必要,而且有条件。他们还指出,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但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出路在于社会主义。“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②他们对基尔特社会主义也进行了批判,指出用“温情主义”的社会政策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只不过是改良主义的幻想。这场论争,使更多人认识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弊病和最后走向灭亡的必然性,同时认清了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中国不能发展资本主义、只能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趋势。划清了基尔特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指出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从而进一步传播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

第三次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20世纪初期,中国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许多知识分子不满现状,具有反抗旧社会制度的愿望,无政府主义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很迎合他们的口味。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无政府主义小团体达30个之多,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达70多种。其代表人物黄凌霜于1919年2月在《进化》月刊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一文,反对马克思主义,宣扬无政府主义观点。他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集产主义”,说“现在集产主义以衣食房屋之类可以私有,是明明尚有个人财产,根本上已背乎社会主义的定义。况且同一房屋牛马的圈厩,既为公有,人居的房舍,则为私有,于理论上也说不过去。”^③同年5月,他又在《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系统攻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最初,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正忙于同胡适的“问题和主义”进行论争,还来不及回击无政府主义的思潮,但到1920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无政府主义思潮已经在党的组织内部有所出现,有所渗透。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和思想建设,更好地开展工人运动,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反击。

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回击了无政府主义。上海《共产党》月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也连续发文批判无政府主义。陈独秀还在《新青年》杂志第九卷第四号开辟了《讨论无政府主义》问题的专栏,形成了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大规模反击,其声势超过了前两次的论争。在论争中,涉及经济学的两个问题:一是关于社会生产是否需要组织和管理。无政府主义主张反对私有制和剥削,也反对生产的组织和管理;主张在社会生产中要充分实现个人自由,自愿的自由组织。他们指责十月革命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土地和工厂的国有化政策,认为这使国家资本主义的存在更加合理,所以并没有真正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二是关于如何进行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在这个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反对社会主义对个人消费品分配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不顾客观条件,幻想实行“按需分配”,人人都“享平等幸福”,否则就是不平等。攻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只能使强有力者“享最高的幸福”,而“能力微弱的,将不能生活”。针

① 参见《陈独秀复张东荪的信》,《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1920年12月。

② 参见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载《五四运动文选》,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488—489页。

③ 参见黄凌霜:《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载《民国思想文丛 无政府主义派》,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年,第112—115页。

对这些观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批驳道，现代社会生产是一个关系复杂的有机整体，要求生产过程和经济运行的衔接和连续，因此“重组织，尚秩序”。如果强调一切个人的绝对自由，必然破坏社会生产过程。如果没有强制性的生产协调而放任个人自由，“试问怎么能够使中国底农业工业成为社会化？怎么能够调节生产只使不至过剩或不足？”“怎么能够转变手工业为机器工业？怎么能够统一管理全国交通机关？”^①关于个人消费品分配，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分配原则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新社会是在原来社会生产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既有限制，生产物当然也有限制了，以这有限制的生产，听各人消费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绝对办不到的。”“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②通过这个论争，有更多人从经济学的角度更深入了解了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更准确地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它使一些知识分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能够在激荡的论争中、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多数的思想界中得到迅速传播并最终占主导地位，不能不思考中国文化土壤这一深层因素。

二、中华文明是吸收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的思想土壤

人类文明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结合的产物，文化是精神生产的主要载体，每个时代的文化都主要反映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最为漫长，由此产生了悠久的传统文化，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做到古为今用。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是一种外来文化，就其内容和表达形式而言，与中国传统文化明显不同，而20世纪初期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在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他们能够心有灵犀、义无反顾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呢？这就是中华文明、文化沃土的精神力量。

1. 同情劳苦大众的情感与民惟邦本的政治主张

同情劳苦大众是古往今来有良知的中国文化人一以贯之的精神素养，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立场和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都有共通之处。

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繁、赋税徭役沉重，阶级矛盾激化，人民生活困苦。许多有良知的士人对纷乱的世界感到悲伤，对痛苦的人们表示怜悯，他们的悲天悯人是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一种感同身受的表达，是一种发自人性的朴素情感。即便主张无为的道家学派，也并不否认：“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③人民饥饿，是因为统治者收的税收太多；人民难于治理，是因为统治者不胜其任；人民漠视生死，是因为统治者对自己厚养太过，导致民不聊生，被逼到了绝路。

儒家学说是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家养民思想发端于仁爱恻隐，这种道德情感，由爱亲出发，推而广之，以达到泛爱众，养天下之民的目标。孔子过泰山侧，有“苛政猛于虎也”的恻隐之心，因此主张节用爱民、均无贫等思想，就是希望统治者对民生有所关照。战国时代，分封制日渐瓦解，统治阶层穷奢极欲，老百姓苦不堪言。孟子及后世儒家知识分子赓续孔子的君子“仁”

^① 参见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9页。

^② 参见李达：《社会革命底商榷》。载《李达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6—56页。

^③ 参见《道德经》第75章。载《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84页。

学,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仁政思想,呼吁统治者要养民保民,引导人们成就美德,成为向善向上之人,最终实现天下“定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理想社会。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离不开“四心”,即恻隐心、羞恶心、辞让心、是非心。孟子以心善言性善,用这四种道德心理证明了人有仁、义、礼、智四种德行。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①其中,孟子最重视者,当为“恻隐之心”,也就是“不忍人之心”。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②所谓“仁”,即“不忍人之心”,而“仁政”的本质,即君主将自身的“不忍人之心”,通过扩充达到推及百姓、恩及禽兽。孟子“性善论”以仁义礼智为根基,强调“善”乃人的天赋秉性,特别注重伦理道德的修养。而作为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对政治至关重要,关乎能否得到民心,政权是否稳固。由此,孟子总结历史经验,提出“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斯得民矣”^③,认为桀、纣之所以失天下,正在于他们丢掉了群众根基。为此,孟子延续了“民惟邦本”的古典政教传统,将“爱民”“为民”“保民”“敬民”的民本思想凝聚为“仁政”学说的思想内核。

即便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对人民的苦难也有恻隐之心。如东汉曹操在《蒿里行》中所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元代名臣兼文化大家张养浩,在他作的元曲《山坡羊·潼关怀古》中说:“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儒家学说影响下,中国古代文人描写民生艰难,表达对底层百姓同情的诗句数不胜数。唐代杜甫创作了许多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石壕吏》等,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唐代白居易《卖炭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白居易《观刈麦》:“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唐李绅《悯农》诗云:“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北宋张俞《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北宋梅尧臣《陶者》:“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明代郑板桥《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些耳熟能详的诗句,无不是同情劳苦大众思想的生动写照,今天读来仍令人动容唏嘘不已。

因此,将民众视为治国理政的根本,是中国古代圣贤早在数千年前就已萌生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主张。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④到孔子的“君以民存,亦以民亡”,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从朱熹的“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到黄宗羲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历史上诸多学者都推崇民本思想,认为民心向背决定了国家和政权的稳固和长远,治国理政重在得民心。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秉承了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人民苦难深怀同情;主张为政须以人民安居乐业为治国根本,同时,他们又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把同情劳动人民的情感和“人民至上”的主张与革命斗争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⑤陈独秀早年就认识到,要使中国人民摆脱苦难,必须从民众的文化

① 参见《孟子·告子上》。载《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34、235页。

② 参见《孟子·公孙丑上》。载《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32页。

③ 参见《孟子·离娄上》。载《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03页。

④ 参见《尚书·五子之歌》。载《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30页。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9页。

和思想两个方面开始唤醒行动。1915年秋他从日本回到中国,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宣扬新文化运动。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又创办了《每周评论》。所刊登文章的内容,针对当时军阀统治混战带给人们的苦难,揭露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山东盗取中国权益的真相,旨在唤醒国人奋起抵抗的信心。拯救人民于水火的陈独秀,后来被毛泽东称赞为“思想界的北斗星”。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于1919年7月14日,为新民学会创办了《湘江评论》报纸,他亲自担任编辑和主笔。毛泽东以《民众的大联合》同一标题,连续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上发表了三篇文章,呼吁平民阶级要推翻贵族资本家的统治,获得自由和解放,必须依靠自身的联合。“我们是农夫。我们就要和我们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别人不种田的,他和我们利益不同,决不会帮我们去求。”“我们是工人。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①可见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火花,正是马克思主义点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火种所产生的结果。

2. 反对贫富分化的社会改革理想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中有忧患意识的士大夫都反对贫富分化,这与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剥削劳动者的理论是相通的。孔子对弟子说:“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②春秋时期齐国大臣晏婴就主张:“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他还认为,人们的财富,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且应“正德以幅之”。统治者不能罔顾民生,要“知其贫富,勿使冻馁”,这样“则民亲矣”,民众才能拥戴你。如果统治者“藏财而不用,凶也……昧财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进而自分也”。^③晏婴作为统治阶层的重要人物,清醒地认识到调节均衡不同阶层人士财富的重要性。墨家也有忧民三患的思想:“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④连主张强权政治、崇尚“法制”的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也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理念。他说:“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⑤在韩非心目中,通过调均税赋而协调不同阶层的贫富关系,是帝王治国安邦的必要条件。西汉董仲舒针砭时弊:“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主张要通过限制土地兼并来解决贫富分化。^⑥此后,在历代士大夫阶层中,反对贫富分化和改革弊政的呼声史不绝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层积淀。从下层民众反抗剥削压迫、要求平均平等的愿望看,反对贫富分化、构建公平社会的思想传统往往成为发动民众造反的思想武器。北宋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提出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南宋钟相、杨幺呼吁的“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的“均田免粮”等口号,都反映了中国社会反对贫富分化的思想文化传统,是自上而下的发自内心的价值认同。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众遭受剥削、生活极度困苦感同身受,对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不公平十分不满。他们一旦接触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剥削的理论,就立刻被真理折服,逐渐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社会观。1920年5月陈独秀发表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针对当时工人受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373、374页。

② 参见《论语·季氏》。载《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49页。

③ 参见《晏子春秋》,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34、49、57页。

④ 参见《墨子·非乐上》。载《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51页。

⑤ 参见《韩非子·六反》。载《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页。

⑥ 参见《汉书·董仲舒传》。载《汉书食货志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7页。

剥削的贫困状况指出：“工人劳力所生产的价值，远在他们每日所得的工资以上；这工资以上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叫作‘红利’分配了”“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①青年毛泽东对工人农民充满感情，1922年他深入调查了解长沙泥木工人生产生活状况，了解到他们劳动条件极差，工资微薄，加上官府的义务公差和封建行会等层层盘剥，生活极为困苦。决心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展斗争。他们组织成立了泥木工会，要求提高工价。而长沙县知事不准加价，后来虽然加了价也未达到工人的要求。1922年10月6日，长沙泥木工人发布罢工宣言，实行大罢工。23日上午，4000多名泥木工人在省教育会坪集合后，向长沙县公署进发，举行请愿。在毛泽东等人领导下，经过持续与执政当局进行谈判，历时20天的泥木工人大罢工获得胜利。泥木工人大罢工的胜利，是长沙工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罢工胜利，鼓舞了长沙和整个湖南的工人，使全省的工人运动更加蓬勃发展，并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人群众中的政治威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情劳动人民的文化情感基因，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发展成为共产党人所应当具备的人民性、阶级性立场。

3. 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和远大志向

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是关注社会和黎民百姓，知识分子多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积极投身社会，把国家的命运视为自己的责任，加入现有的政权，参与政治讨论；另一方面，他们以旁观者的角度观察政治，批评其弊端，为社会改革提供建议。士人们关注社会政治，不仅出于个人利益，更表现为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深切关怀。孔子一生学“礼”，感悟天道，想的是天下人如何安居乐业，有序而行。这种情怀和志向集中体现为士人们的忧患意识。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②可见，当时的儒家学者们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而孔子生活在“天下无道”的春秋时代，《说苑·建本篇》说：“公扈子曰：春秋，国之鉴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③孔子对于礼崩乐坏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论语》中有多处讲到“忧”，其中“君子忧道不忧贫”^④可以说代表着孔子的精神。道是什么？就是孔子行仁道的理想，因为失道会使绝大多数人陷入贫困。古代知识分子常自诩以天下为己任，正如《论语》中所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⑤一个有志向和强大意志的人必须坚强，因为他担负的责任很重，达成目标的道路很长远，把仁义当作自己的担负，还不算重吗？这个担子必须一直承担下去，到死才可以放下，还不算远吗？孟子借古圣人的情怀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⑥大禹一想到天下有人淹在水里，就觉得仿佛是自己使他们淹在水里似的；后稷一想到天下有人挨饿，就觉得仿佛是自己使他们挨了饿似的，所以才迫不及待地去拯救他们。这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北宋政治家、大文学家范仲淹的著名诗句，充分体现出了儒家思想的抱负——以天下为己任！北宋张载著有《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理想与追求，激荡着儒家学者们内心深处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这些文化精神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形成了中国文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精神

① 参见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17页。

② 参见《周易·系辞下》。载《周易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480页。

③ 参见《说苑·建本篇》。载《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9页。

④ 参见《论语·卫灵公》。载《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37页。

⑤ 参见《论语·泰伯》。载《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96、397页。

⑥ 参见《孟子·离娄下》。载《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97页。

支柱的家国情怀和远大志向。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在反抗黑暗统治、外来压迫的政治斗争和民族斗争中,始终激励着中国人特别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弘扬了有志之士实现其卓尔不凡品行的社会习俗;滋养了中国文化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特定的人生价值观,视死为荣、轻生尚气的士大夫名士气节和民族气节。

马克思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远大抱负,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理想与中华文明的天下观和“天下大同”理想是相通的,与中国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的情怀和志向也是相通的。陈独秀曾说:一手托着国格,一手托着公理,失掉了哪一个,都是对国家的犯罪。我们就要做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不怕天罚,敢于盗火,为苦难的中国照亮前程。李大钊说: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毛泽东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青年毛泽东还在橘子洲头写下《沁园春·长沙》:“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这首词抒写出革命青年对国家命运的感慨和以天下为己任、蔑视反动统治者、改造旧中国的豪情壮志,也代表着青年毛泽东对正确革命道路的不断求索与叩问。周恩来在12岁时,就有“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豪情壮志,后来在南开学校学习期间,周恩来在《一生之计在于勤论》的作文中写到“求学贵勤,勤则一生之计足矣。人人能勤,则一国之事定矣。”^①中国革命者和文学家茅盾12岁时写下一生的追求和信仰:“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此后的人生里,茅盾始终牢记这句话,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奋斗了一生。

4. 反抗黑暗统治和压迫的爱国主义精神

反抗黑暗统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最深厚的文化传承之一,留传了大量千古名作。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的思想也是相通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根本原则是:无产阶级只有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才能获得被压迫民族的支援,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从而战胜国际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理论。这些理论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战国时期楚国屈原有“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汉代班超“投笔从戎”;三国时期魏国曹植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唐代戴叔伦有“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岳飞有“精忠报国”“还我河山”;宋代陆游有“楚虽三户能抗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文天祥的《正气歌》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清代抵抗英国殖民主义鸦片输入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抱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胸怀;^②康有为变法上书遭到挫折后,以“岂有汉廷思贾谊,拼教江夏杀祢衡”^③激励自己继续斗争,坚定革命信念。谭嗣同为变法抱必死决心,以“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④鼓励自己,从容就义,为唤起国人的觉醒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精神鼓舞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主义,激励了近代革命志士,成为他们斗争的动力源泉。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在《忆天问军中》一诗中,将东汉班超与屈原、岳飞相提并论,表现了他作为无产阶级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周恩来早期文集(一九一二年十月——一九二四年六月)》(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页。

② 参见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其二》。载《林则徐诗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442页。

③ 参见康有为:《出都留别诸公》。载《康有为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60页。

④ 参见谭嗣同:《狱中题壁》。载《谭嗣同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308页。

革命家以中华爱国主义精神为传承的高尚情操。同样,杨匏安烈士在就义前写给难友的诗中,以东汉和南北朝历史人物的典故,来表达自己坚持气节的决心,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牺牲精神。而毛泽东在他的讲话、书信以及文稿中经常引用汉代的典故,展现出了他对名士节操的深深敬仰和推崇。这并不是因为《后汉书》的写作风格如何精妙生动,而是因为汉代名士的节操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文化源泉。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①

5. 追求天下大同的社会改造观

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远大理想。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实现了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理想不仅在欧洲,即使在中国也有它的雏形版本,说明追求天下大同是中外文化共同的价值追求。只不过马克思主义把这些美好的愿望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尚书·尧典》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中国古人对理想生活和大同世界的一种追求和向往。古代儒家的大同思想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被称颂为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其言论被记载在《礼记》的“礼运篇”中,它的形式是孔子与其门人们的一段对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②《尚书·周官》说:“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吕氏春秋·贵公》对“天下为公”的思想观念阐释得更为透彻,如“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③儒家从“仁道”出发,憧憬“天下为公”,强调“立君为民”“立君为公”,^④包含着超越时代的道德观念和政治理想。

大同思想在中国几千年文化中源远流长,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乌托邦思想最发达的时期之一。一个著名的典型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花源记》设计的理想国,在中国乌托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影响,所谓“世外桃源”和“大同”一样,成为封建时代人们所憧憬的“人间乐土”。到了中国近代,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接触了社会进化论以及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因此把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发挥到极致。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期间写作完成了《大同书》,并于1913年后陆续发表。康有为把《礼记》的“礼运篇”关于“大同”“小康”的说法同《公羊春秋》的“三世说”结合起来,把“小康”等同于“升平世”,把“大同”等同于“太平世”。全书就是关于人类美好生活的空想设计。与以往“大同”社会的空想最大的不同是,康有为的“大同”提出了去私产和生产资料公有的主张:“今欲至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⑤而且还设计了社会经济计划化的图景。这些天真的理想,虽然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科学的,但对于后人思想的启迪作用仍然是宝贵的。

总体而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信仰的文明基因,同时又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形成了有机统一的新的政治信仰和理想。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3页。

② 参见《礼记·礼运》。载《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062页。

③ 参见《吕氏春秋·贵公》。载《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25页。

④ 参见《尚书·周官》。载《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8页。

⑤ 参见康有为:《大同书》,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240页。

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领导新文化运动期间,指出孔子的“大同”论与近代以来的自由、民主、平等、共和不是一回事。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并未否定大同理想,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康有为对于大同理想光讲不做,而新青年派知识群体要做的是探索实现大同理想、实现真正的天下大同的道路。年轻时的毛泽东对《礼记》这部书非常熟悉。在1913年10月至12月记的《讲堂录》以及稍后的书信和文章中,曾引用了不少《礼记》中的话。大同的目标就是先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同世界,接着便是实现全世界的大同。毛泽东就是带着这种伟大的理想,开始了他的革命征程的。在他伟大的革命的一生中,时时都没有忘记建立“世界大同”的理想。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康有为曾有著名评价:“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①中国的大同观念的传统,不仅仅关乎未来的社会理想、目标或信仰,同时也关乎致力实现大同理想的道路探索和实践本身。与写《大同书》的康有为相比,中国共产党人的超越,既在于把大同理想从悬置状态变成当下革命和变革实践的具体目标,更在于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走出了一条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扎根中国的关键

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影响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但是,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还没有深刻认识到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只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理论和十月革命胜利昭示的世界发展趋势,得出中国革命必然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他们还没有一套成熟的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消灭一切剥削、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还缺乏真正能指导实践斗争的理论。这个探索过程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形式问题。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能够在中国扎根,必然是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创造创新发展的关键过程。

1. 利用反抗外侮的民族传统发展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群众运动

反抗外侮始终是中华文明的主流精神之一,也是中华民族不可能被外来民族征服的精神支柱,具有深厚长远的民众基础。孔子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②,西汉名将陈汤有名言:“宜悬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③意思是:对冒犯我强汉的人,即使再遥远也要诛杀。从此,“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成为千古名言和中华民族的斗争传统。这与毛泽东的名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斗争原则一脉相承。在中国历史上,凡是主张抵抗外侮,敢于坚持民族斗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仁人志士,都受到历代人民的颂扬和怀念。即便是在中华民族大融合过程中,那些对发动战争和掠夺杀戮进行反抗的人们,同样受到历史的记忆和民族的尊重。卫青、霍去病抗击外敌,出生入死、国而忘家;名将马援以“马革裹尸”自誓,并付诸实践;班超投笔从戎,终定西域,“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西晋“永嘉之乱”后,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名将祖逖率兵“北伐中原”拯救人民,留下历史上著名的“中流击楫”的佳话。岳飞抗金斗争承载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也留下了“精忠报国”的民族精神。明代爱国志士英勇抗击倭寇,使沿海人民得以安居乐业。17世纪西方殖民者侵占台湾,郑成功驱除荷兰殖民者,使台湾重回祖国怀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② 参见《论语·宪问》。载《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91页。

^③ 参见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15页。

抱。进入中国近代,在英国殖民者发动的鸦片战争中,林则徐率师抵抗,1841年5月29日至31日,广州三元里人民自发组织了万余名乡勇,投入与英军的战斗之中。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人强行要求进入广州城,并欺侮中国商民,群众奋起焚毁洋馆。钦差大臣耆英被迫通知英国人暂缓入城。1847年,耆英派员与英国人密订进城日期,数千群众闻讯闯入府衙,烧毁知府衙门。1849年,英国人重提入城要求,广州十余万民众齐集珠江两岸示威,英殖民者被迫放弃入城要求。中华民族的斗争传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民众基础。

在早期的现实斗争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并不是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外国资本控制着中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在全国大中城市发生的工人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同帝国主义发生冲突,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即使工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也很容易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千方百计破坏以致武力镇压群众斗争,中国共产党人从现实斗争中认识到,中国革命不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因此,回答这个时代中国人民追求自由解放之问,是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在中国扎根的核心关键之一。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明确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后一年的很短时间内,就能够从中国国情出发,初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需要经历一个民主革命的阶段,才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对中国革命道路认识的转变,除了吸收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说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之外,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贡献。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纲领落实在经济纲领上,就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思想和理论。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中,转化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经济制度的斗争,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封建军阀经济统治的实践行动,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扎根培育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2. 唤醒中国农民伟力激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大动力

旧中国极端贫困落后,农业是国民经济主要部门,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192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为159.28亿元,其中近代工业产值为9.88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2%,只有手工业总产值44.45亿元的22.2%。近代产业工人约200万人,而且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和武汉,这三个城市的工人数,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7%以上。^②中国当时的总人口是4.5亿人,农民占总人口比例约80%,工人总数大约20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不足0.5%。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大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8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年,第26、27页。

多数人的运动，中国革命只有200万人近代工人参加显然是不够的。到哪里寻找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中国革命面临的核心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过程中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早就意识到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认识到农民和农村对于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回答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千年愿望之问，是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在中国扎根的另一核心关键。1919年2月，李大钊就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①1922年，党的二大更是在宣言中明确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强调“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大革命时期，随着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又有了新发展。1925年召开的党的四大初步形成了农民是工人阶级同盟军的思想。同年，彭湃指出：农民就是全国最大多数的国民，中国国民革命若不得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参加，则革命断不能成功。1926年，他又说：半殖民地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换句话说，半殖民地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便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解放运动。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所以，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占据最主要的地位，农民运动问题是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根本问题。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也有许多阐述。1926年5—6月，他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说：辛亥革命的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完全是因为未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帮助与拥护。唯有把农民动员起来，参加革命，国民革命才能成功。因此，“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同年9月1日，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更充分论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②12月，他又在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强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

农民解放不仅是中国革命要解决的中心，农民的反抗力量更是中国革命最大的动力源泉。毛泽东说：“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中，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对农民的作用做了更加全面的论述。他强调指出：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④

正是由于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土地问题给予了以往任何

^① 参见李大钊：《青年与农村》。载《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22—426页。

^②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是《农民问题丛刊》的序言。这套丛刊，是毛泽东1926年5月至9月在广州主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为了总结推广国内外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以指导和促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主编的，原计划出版52种，实际上出版了26种。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收藏了24种。

^③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3、625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05页。

一个政党都没有过的重视。不仅口头讲,而且还实际干,在中国广袤的农村领导了一场艰难曲折而又波澜壮阔的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并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农民的积极拥护。在农民的土地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没有完全复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2年后实行的集体农庄制度,^①没有立即实行土地公有,而是把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正如毛泽东所说:“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②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农民的深刻了解,以及对农民反抗黑暗统治历史传统的科学认识,使他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从而使解决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问题成为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之一。这个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人口最多、劳动者最多的农村扎根提供了创造性的贡献。

3. 利用和节制民族资本是“两个结合”的另一新创造

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的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内在矛盾,主张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这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十分成熟情况下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如何转化为中国的理论,也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回答资产阶级在中国国情下的特殊性,也是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在中国得到广泛支持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提出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利用和节制民族资本的政治经济思想,形成了一套完整、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从政治上看,“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③这里讲的重要性,实际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一直具有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传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新式工业开始出现,反映民族资本利益的思想家和认识主张也不断出现。这些思想既希望接受资本主义先进的工商业,又对西方国家的殖民掠夺和侵略不满。其代表人物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就表达了民族资本的这种思想,其名言是“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④,这种商战思想反映了民族资本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性一面。反对外国经济侵略和防止中国利权外溢,在中国思想界是一股重要的潮流。他们揭露了在外国经济侵略下,中国陷入“如水渐涸而禾自萎,如膏渐销而火自灭”的困境,^⑤中国要反对外国侵略,就必须“先富而后强”,^⑥在反对经济侵略中要“自握利权,自浚利藪”,为中国“兴

① 1929年下半年,前苏联开始全盘集体化,实行大部分生产资料公有制。1930年,联共(布)中央确定集体农庄的基本形式是农业劳动组合,即土地国有,由劳动组合永久使用,其他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集体所有;组合农户共同劳动,收入在作了各项必要扣除后按参加劳动的数量分配,组合农户可以保留小农具和一定数量的家畜家禽、经营规定的宅旁田地和家庭副业作为辅助收入。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8页。

③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9页。

④ 参见郑观应:《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载《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48页。

⑤ 参见薛福成:《用机器殖财养民说》。载《中国历史文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7页。

⑥ 参见王韬:《中外合力防俄》。载《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96页。

利”。^①近代民族资本实业家张謇对外国经济侵略更有切肤之痛，他看到清末因大量进口外国产品形成的贸易逆差，认为照此下去，中国“即不亡国，也要穷死”。^②要求发展民族工业，而外国在华企业“最为心腹之患”，^③所以中国应当“设厂自救”。孙中山最初对外国资本有过幻想，也主张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利用外债，但是“孙先生有了经验，他吃过亏，上过当”。“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④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具有斗争性的一面，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的政治前提。

从经济上看，“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上的比重还很小……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⑤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从诞生起就一直有发展中国自身经济的愿望和主张，从郑观应的以商业为中心的经济思想，到康有为的振兴实业、以工立国的主张，再到实业家张謇以棉铁为中心发展实业的构想，以及孙中山先生的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实业计划》方案，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基本观点并不矛盾，也与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剥削，努力发展经济，解决中国人民极端贫困的现阶段目标并不矛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在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主要矛盾中居于次要地位，是非对抗性矛盾，而且在“节制资本”的方针下也是可以得到解决的。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经济政策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发展。至此，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的完整提出，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扎根的第一个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开创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四、结论与启示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是海纳百川的文明形态，它具有吸收消化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的重要功能。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作为人类发现的真理，中华文明对它的吸收和消化具有天然深厚的思想土壤，它一经在中国传播就受到先进中国人的欢迎并被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而科学回答时代之问、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问，是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在中国传播与扎根的核心关键。当前，回答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发展和创新的前进方向。要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需要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基因，使之与中国具体实践相融合，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成为中国化的、具有生动实践内容的、生命力旺盛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开辟新境界。

① 参见王韬：《兴利》。载《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6页。

② 参见张謇：《辛亥五月十七日召见拟对》。载《张季子九录》（卷三），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第38页。

③ 参见张謇：《遵拟整饬国货建议案办法呈》。载《张季子九录》（卷九），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第18页。

④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5页。

⑤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9页。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in China

PEI Chang-hong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Chinese economics research to innovate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innovative project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build an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system.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t theory is the result of “Two Integration”. If we try to innovate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research, we must consider and explore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The theme and key thought of this paper highlight the condition of cultural soil for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to take root in China and to achiev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the way of the “Two Integration”. Guid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s latest thought on the “Two Integration”, this paper employs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history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rough extensive classical and modern literature.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and its economic theories in China encountered inevitable resistance from imperialist forces, warlord regimes, and anti-Marxist ideologies.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period, Marxism achieved rapid propagation and eventual dominance through three major intellectual debates, a phenomenon deeply rooted in China’s cultural soil: The political advocacy of sympathizing with the toiling masses and people-oriented governance resonates with Marxism’s proletarian standpoint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at indicates the people creating history; The social ideal of opposing polarization between rich and poor was interlinked with Marxist theory of opposing the capital exploit to workers; The great ambition of rescuing nation and people was accorded with long-range aspiration for Marxism’s vision of human emancipation;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against oppression correlates with Marxist liberation theories for oppressed nations; The pursuit of a world of universal harmony represents a shared value across civilizations. Marxism had translated this favorable fantasy from dream to science. Beyond cultural compatibility, the CPC’s creativ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wisdom with revolutionary practice is proved crucial for Marxism and its economics to take root in China: Leveraging 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rebelling against foreign aggression to launch a mass movement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of anti-imperialism and anti-feudalism; rousing great force of Chinese peasants to motivate biggest power of New Democracy Revolution; using and moderating national capital to create new realm of the “Two Integration”. The conclus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an extraordinary function of absorbing advanced achievements of mankind’s civilization. As scientific truth, Marxism found natural resonance in China’s cultural soil. Once it had been diffused in China, it quickly received welcome and studied by advanced Chinese. Scientifically answering the question of times and the question of Chinese people and world people is the key for Marxism and its economic theory to take root in China. Now, it i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Marxism and its economic theory to answer how to push ahead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realize the great renaissance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paper’s academic contribution lies in systematically revealing the inherent compatibility between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and Chinese cultural ethos, demonstrating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Marxism’s Sinicization.

Key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cultural inheritance; “the Second Integr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B24 O20 P21

[责任编辑:王燕梅]